

# 中美政党外交：历程、特征及效果评估<sup>[1]</sup>

——基于中美政党对话的考察

李晨阳 窦孝勇

**【内容提要】**相对于全球瞩目的中美政府外交，中美政党外交更像是“隐秘的角落”。开启于2010年的中美政党对话已连续举办了13届，这一机制在增进中美彼此了解、进行战略沟通、促进务实合作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虽然相关文献资料和公开报道极为有限，但仍可为“另辟蹊径”观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中美政党外交经历了频繁互动期、趋于成熟期和迎难而上期三个阶段，在促进中美双方交流政治见解、构建正面认知、保留对话渠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政治效应。尽管政党外交并非推动中美超越分歧和矛盾的根本途径，但不失为两国开展稳定多层战略沟通、保持各层级对话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中美政党对话 中国共产党 政党外交

**【作者简介】**李晨阳，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缅甸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窦孝勇，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4-0024-25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3年5月23日，第13届中美政党对话（U.S.-China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Dialogue）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围绕“中美相互认知与互利合作”主题进行了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出席对话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中方部委、地方政府、高校以及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地方、智库共约50名代表出席。在近年中美关系持续走低以及突发事件干扰的大背景下，中美政党对话再次举行，双方都表示中美如何相处至关重要，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加强交流对话，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并健康发展。<sup>[1]</sup>此次对话的举办，与其他渠道的中美沟通交流一道，为两国关系转圜释放出积极信号。同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sup>[2]</sup>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如何找到正确的长久相处之道，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构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保持多领域、多层次的沟通；观察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呼唤多维度、多视角的考察。自2017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着手加大对华遏制打压以来，学界围绕两国的战略博弈、经贸摩擦、科技竞争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对中美关系开展了诸多考察。<sup>[3]</sup>作为中美之间进行沟通的机制化渠道，已连续举办13届的中美政党对话并未引起国外学者的足够关注，媒体信息几乎均来自对话的美方协办机构东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 EWI）、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George H. W. 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等网站。国内对中美政党外交的专门研究文章也屈指可数，有限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会议综述、纪实及新闻报道，其大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的一部分散落在众多文献之中。有的研究事实上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对美总体外交战略，

[1]《第十三届中美政党对话举行》，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25日，第3版。

[2] 钟声：《承担大国责任才能合力造福世界》，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4日，第3版。

[3] 参见谢琛、潘锐：《美国主导的多边出口管制合作——以对华芯片封锁为例》，载《美国研究》2023年第6期，第126—157页；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133—154页等。

并未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交往。<sup>[1]</sup>

2010年举行的首届中美政党对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式建立直接对话机制。中美政党对话迄今已连续举办13届,并未因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或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中断,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展示了政党外交在中美沟通中的特殊作用。2023年5月举行的第13届中美政党对话,为双方打破沟通僵局做出了贡献。正如有学者所言,中美关系的演变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和小周期的作用<sup>[2]</sup>,影响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交织出现,但中美政党对话这一特殊的外交形式何以能够穿越中美关系的大趋势和小周期,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机制化的稳定沟通渠道?其对中美关系又能产生何种政治效应?为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党外交机制——中美政党对话为考察对象,全面梳理其发展历程、分析其特征并评估其政治效应,既为体现“二轨”交流机制对增进中美关系的独特作用,也希望为学界和实务界挖掘和调动两国关系中的积极能动因素提供有益参考。

## 一、中美开启政党外交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sup>[3]</sup>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坚持“超越分歧与差异,寻求理解与合作”,积极发展同大国大党的双边政党外交。而中美政党直接对话机制建立的相对较晚,主要原因正如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2007年9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现在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党际交往关

---

[1] 张睿壮、刘丰:《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4—22页。

[2] 吴心伯:《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第56—70页。

[3] 刘建超:《推动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高质量发展》,《求是》网,2022年10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0/01/c\\_1129040656.htm](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0/01/c_1129040656.htm)。

系，其主要障碍不在中方，中共的大门是敞开的。也许应该回去问问美国两大党的领导人原因何在。”<sup>[1]</sup>究其原因，主要源于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美国政党政治的固有特点。一方面，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美国两党对同中国共产党开展直接交往心存疑虑。诚如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东西方研究所前高级副总裁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所指出的，中美政党建立直接联系的主要困难在于“美方对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想法存在政治敏感性”。<sup>[2]</sup>由于双方长期缺乏直接对话渠道，美国政界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了解，以至产生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美国两党的主要活动场域是国内，主要目标是赢得国内大选，跨国交往并不能对其国内政治需要产生效用，因而美国两党总体上缺乏与外国政党保持日常联络的动机。<sup>[3]</sup>加之美国两党制的特点，导致要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必须在民主、共和两党合作的基础上，这样任何一党都无法指责另一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这也就意味着两党谁率先单独与中国共产党接触都心存顾忌。

中美政党开展直接对话，既是双方超越意识形态、相向而行的结果，也是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动加强同美国各界的接触，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方的疑虑和偏见。尽管2010年之前中美政党缺乏直接对话渠道，但并非完全没有接触。有国外学者注意到，中联部曾尝试通过与美国智库密切接触来弥补与美方有限的党际接触。<sup>[4]</sup>长期以来，

---

[1]《张志军：与美国两大政党未建立直接党际交往其障碍不在中方》，中国政府网，2007年9月25日，[https://www.gov.cn/wszb/zhibo154/content\\_760931.htm](https://www.gov.cn/wszb/zhibo154/content_760931.htm)。

[2] David J. Firestein and Tony Bricktua, “Firestein Reflects on Seven Years of U.S.-China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Meetings,” EastWest Institute,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eastwest.ngo/idea/firestein-reflects-seven-years-us-china-political-party-leaders-meetings>.

[3] 温尧：《理解政党跨国交往：意愿、禀赋与形态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9期，第122—124页。

[4] Christine Hackenesch and Julia Bader, “The Struggle for Minds and Influ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lobal Outre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3, 2020, p. 726; David L. Shambaugh, “China’s ‘Quiet Diplomac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 No. 1, 2007, p. 47.

中国共产党依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同美国国内一些与民主、共和两党关系密切的智库和政界人士交往。1998—2006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曾6次邀请有共和党背景的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AFPC）组织美国前政党政要访华，并7次派团访美；200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首次组团访美，广泛同美国政界、智库、研究机构接触。<sup>[1]</sup>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也强化了美国两党基于利益考量而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进而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的意愿。2009年和2011年，中美元首实现互访，就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参加首届中美政党对话的美国两党代表认为，“中美政党之间的政治理念互不相同，但在促进国家繁荣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与任务”，中美开展政党交往并非要“试图说服对方”，而是“寻找共同点和共同利益”，“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及合作范围”。<sup>[2]</sup>

## 二、中美政党外交的发展历程

中美创建政党直接对话机制，源于两国政党加深彼此了解的意愿和相向而行的共同推动。中美政党外交经历了频繁互动、逐步趋于成熟，以及受两国关系影响而进入迎难而上期。但总体而言，中美政党外交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反映出双方在以政党外交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方面有共同的认知。

### （一）中美政党首次对话开启机制化交往之路

2010年3月30日至4月2日，应中联部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民主党人）和前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森（Richard Williamson，共和党人）率两党代表团访华并举行首届中美政党对话，标志

---

[1]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2] 韩伟：《开启中美政党交往新篇章——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团访华暨第一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纪实》，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5期，第17页。

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机制化交往正式开启。<sup>[1]</sup>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方代表团时指出：“加强接触和对话，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使党际交往成为中美两国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推动力。”<sup>[2]</sup>中方在首届对话中表现出来的坦诚开放态度，给美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两党代表意识到政党对话在实现中美直接沟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参加首次对话的奥尔布莱特回国后，向时任总统奥巴马汇报了中美政党对话的情况，希望美国政府高层也参与其中。<sup>[3]</sup>一些长期观察中美关系的人士认为，首届中美政党对话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故事的最后一章”和进入新世纪“10 年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进展”。<sup>[4]</sup>

首届中美政党对话在两国关系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填补了中美政党直接交往的空白，开启了双方对话的机制化之路，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直接交流，而且丰富了中美对话渠道，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 （二）中美政党外交历经三个时期并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 1—11 届中美政党对话在中国首都北京和美国首都华盛顿轮流举行，第 12、13 届对话以视频方式举行。依据对话时序、频次以及中美关系发展阶段，大致可将中美政党外交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2010—2011 年为频繁互动期，2012—2017 年为趋于成熟期，2019 年以来为迎难而上期（见表 1）。

---

[1] 王栋：《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大国大党对话机制》，载《公共外交季刊》2012 年第 3 期，第 41 页。

[2] 贺钧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1）》，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5—296 页。

[3] 于洪君主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7 页。

[4] Piin-Fen Kok, “1st U.S.-China Breakthrough,” EastWest Institute, April 9, 2010, <https://www.eastwest.ngo/idea/1st-us-china-breakthrough>.



表1 第1—13届中美政党对话发展阶段划分

发展阶段	届次	时间	地点
频繁互动期	1	2010年3月31日—4月1日	北京
	2	2010年12月2—3日	华盛顿
	3	2011年9月27日	北京
	4	2011年12月8日	华盛顿
趋于成熟期	5	2012年12月10日	华盛顿
	6	2013年11月18日	北京
	7	2014年5月5日	华盛顿
	8	2015年5月6日	北京
	9	2016年11月14日	华盛顿
	10	2017年12月4日	北京
迎难而上期	11	2019年11月18日	北京
	12	2021年9月13—14日	视频
	13	2023年5月23日	视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1—2021）及公开资料整理。

**频繁互动期：**2010—2011年举办第1—4届中美政党对话。这一时期，中美政党在两年内密集举行4次对话，实现了年内双方“一来一往”，对话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呈现出高频次的显著特点。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在年内相继成功举行，反映了双方加强交流的强烈意愿和对政党对话渠道的高度重视。第3、4届对话间隔不足3个月，充分体现了这一阶段中美政党对加快彼此了解、构建彼此认知的共同愿望。

**趋于成熟期：**2012—2017年举办第5—10届中美政党对话。这一时期，中美政党对话由每年2次调整为每年1次，尽管频次有所减少，但仍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机制化程度更趋成熟，议题更加务实，战略沟通效果更加凸显。在第5届对话会上，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共十八大的情况、中国未来的发展思路和举措，双方认为对话促进了彼此了解和信任，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第8届中美政党对话，首次在该框架下举行了中美

企业家圆桌会，双方从纯粹的政党交往扩大到增设经贸议题，打造更为立体的政治家、企业家、媒体、智库间对话，体现了中美政党对话机制正逐步走向成熟。<sup>[1]</sup>

迎难而上期：2019—2023年举办第11—13届中美政党对话。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和“战略竞争对手”<sup>[2]</sup>，并着手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受此影响，2018年成为中美政党对话开启以来首个未举行对话的年份。从表面看，这是由于中美政党对话频次调整导致的空档，深层次原因或源于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尽管中美政党对话频次下降，但双方代表仍视其为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并未因中美关系气氛恶化和疫情影响而中断，继续保持了稳定性和延续性。2019年11月，在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后举行的第11届对话会上，美方代表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两党代表愿发挥积极作用，同中方积极沟通、坦诚对话，共同找到妥善处理摩擦分歧的办法，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sup>[3]</sup>在第12、13届对话会上，双方就继续开展政党对话达成共识，为中美两国关系保留了这一重要而特殊的沟通渠道。

### 三、中美政党外交的主要特征

通过考察其发展历程特别是对话时序可以看出，中美政党外交呈现出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此外，中美政党外交还具有参会代表兼具稳定和多元、议题设置与双边关系紧密相关、对话形式兼具官方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1]《第八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京举行》，新华网，2015年5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6/c\\_111520072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6/c_1115200720.htm)。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3]《王岐山会见参加中美政党对话美国代表团》，新华网，2019年11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20/c\\_112525474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20/c_1125254747.htm)。



(一) 参会代表兼具稳定和多元

根据参加历届中美政党对话主要代表的情况，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一些显著特征（见表2）。

表2 参与第1—13届中美政党对话的主要代表

届次	中方主要代表	美方主要代表	
		民主党代表	共和党代表
1	时任中联部部长 王家瑞	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
2			
3			前国会众议员文·韦伯 (Vin Weber)
4			
5			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
6	时任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联部部长 王家瑞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 席霍华德·伯曼 (Howard Berman)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 安东尼·帕克 (Anthony Parker)
7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宾 夕法尼亚州前州长爱德华·伦 德尔 (Edward Rendell)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罗伯特·邓肯 (Robert M. Duncan)
8		前贸易代表、达拉斯市前市长 罗纳德·柯克 (Ronald Kirk)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退伍军 人事务部前部长詹姆斯·尼科尔森 (James Nicholson)
9	时任中联部副部长 郭业洲		国土安全部首任部长、宾夕法尼亚 州前州长汤姆·里奇 (Tom Ridge)
10	时任中联部部长 宋涛	马里兰州前州长马丁·奥马利 (Martin O'Malley)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 阿方索·杰克逊 (Alphonso Jackson)
11		商务部前部长、前驻华大使 骆家辉 (Gary Locke)	
12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安 (Howard Dean)	前贸易代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 部长卡拉·希尔斯 (Carla Hills)

续表 2

届次	中方主要代表	美方主要代表	
		民主党代表	共和党代表
13	中联部部长 刘建超	民主、共和两党及地方、智库代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1—2021）及美国东西方研究所（<https://www.eastwest.ngo/>）等网站公开资料整理。

第一，中方主要代表保持稳定，参会人员依据议程设置呈现出多元性。中联部负责协调组织举办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政党对话，参会中方代表为中联部主要负责人。中方代表团由中联部牵头组成，邀请中纪委、中宣部、中央政研室等中央部委以及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高校负责人参加。2011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4届中美政党对话，由时任中联部部长王家瑞担任团长，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中联部、中央政研室等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负责人。<sup>[1]</sup>根据对话的议题设置，中方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会介绍情况。2015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8届中美政党对话，邀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预防腐败局（该局于2007年成立，2018年撤并入国家监察委）的负责同志介绍依法治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第二，中方代表均为政府现职高级公务人员，美方代表通常为有影响的前高官、智库人士等战略界精英。中方代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性”和“权威性”；美方代表反映出美国政党和行政分离的特点，也体现出美方将此对话作为“二轨”外交的定位。在历届中美政党对话中，中方代表主要是来自中联部、中宣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在职党政负责人。美方代表主要是美国前国务卿、前部长、前州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国会前议员等前政要，以及东西方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等智库的负责人。

第三，美方主要代表在中美政党外交频繁互动期较为稳定，之后呈现

[1]《第四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8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政府网，2011年12月9日，[https://www.gov.cn/jrzq/2011-12/09/content\\_2015532.htm](https://www.gov.cn/jrzq/2011-12/09/content_2015532.htm)。

多元特点。美方代表团一般为“双团长”，由民主、共和两党各派一位代表担任团长。出席第1—5届中美政党对话的民主党团长均由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担任，出席第1—3届和第5届对话的共和党团长均由前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森担任。前几届对话中美双方主要代表保持稳定，避免了人员变动导致的反复沟通，有利于双方在短时间内构建彼此认知。从第6届对话起，美方政党选派代表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多元性，两党团长均由不同的前政要担任，且根据中美关系现状及对话议题选派不同相关人员。如2019年举行第11届政党对话时正值中美陷入贸易摩擦，美方即派出具有华裔身份的前驻华大使、商务部前部长骆家辉担任民主党团长，显示美方有通过两国政党对话沟通、调解当时所面临贸易摩擦的意图。

参加中美政党对话的中方主要代表的稳定性，体现了其“官方性”和“权威性”，为中美政党对话的稳定和延续奠定了基础。美方主要代表的“非官方性”以及多元性、灵活性，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话与美国两党前政要及战略界精英广泛开展沟通交流、建立联系创造了条件。

## （二）议题设置与中美关系发展紧密相关

中美政党对话重点围绕两国关系设置议题，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见表3）。从历届中美政党对话的主题及主要议题中不难发现，中美政党对话重点围绕当时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设置议题，因此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

表3 第1—13届中美政党对话主题及议题

发展阶段	年份	届次	主题及主要议题	议题侧重点
频繁 互动期	2010	1	中美关系、中美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美政党建设和执政理念、中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流政治见解 加快彼此了解
		2	中美政党执政理念与实践、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2011	3	各自执政理念、经济社会政策调整和创新以及中美关系	
		4	中美两国的未来及政党的作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务实合作	

续表 3

发展阶段	年份	届次	主题及主要议题	议题侧重点
趋于成熟期	2012	5	围绕“两国政党未来几年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方略”“如何维护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深入交流	开展战略沟通 促进务实合作
	2013	6	围绕“中美两国政党如何创新政策理念应对国内挑战”“中美两国如何加强协调合作共建和谐亚太”坦诚、深入交流	
	2014	7	讨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	
	2015	8	围绕“法治与中美各自未来发展”主题，就各自执政理念、政策主张和发展战略，各自反腐与法制社会建设及举措，管党治党相关做法对话	
	2016	9	围绕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等开展交流	
	2017	10	围绕“中国与美国：新起点、新机遇、新合作”主题展开对话	
迎难而上期	2019	11	围绕“中美政党与中美关系”主题，就各自政党的执政理念与未来战略、中美各自外交理念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等进行讨论	促进增信释疑 重寻双方共识
	2021	12	围绕“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前景：政党的作用”主题，就中美各自国内形势及中美关系前景等深入交换看法	
	2023	13	围绕“中美相互认知与互利合作”主题开展交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1—2021）及公开资料整理。

第一，在频繁互动期，对话议题侧重于交流政治见解，加快彼此了解。如第1—4届中美政党对话，议题设置明显体现构建认知的特征，“各自执政理念”是双方交流的重要内容。在首届对话上，中方介绍了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美方介绍了美国政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sup>[1]</sup>在第3届对话上，中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中的作用，美方代表介绍了减债、促进经济增长等国内政治议程。双方共同认为，“有必要关注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以坦诚和开放的方式增进相互理

[1]《第一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3月31日下午在京举行》，中国政府网，2010年3月31日，[https://www.gov.cn/jrzq/2010-03/31/content\\_1570734.htm](https://www.gov.cn/jrzq/2010-03/31/content_1570734.htm)。

解”。<sup>[1]</sup>中美政党外交频繁互动期的政治见解交流，加强了中美政党政策理念沟通，加快了彼此了解，为促进双方进一步对话沟通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趋于成熟期，对话议题侧重于开展战略沟通，促进务实合作。2011年第4届中美政党对话，议题开始关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务实合作”，并探索开展中美地方之间务实合作。此后，在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等重大会议后开展的中美政党对话，议题进一步拓展，双方围绕未来几年各自的执政理念、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战略沟通。2012年12月第5届中美政党对话，时值中共十八大闭幕和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双方围绕“两国政党未来几年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方略”和“如何维护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开展交流。<sup>[2]</sup>2013年第6届中美政党对话，双方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下，如何在中美之间建立互信以及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等战略性议题开展对话。最初几轮对话，双方议题聚焦于交流彼此政治制度、执政理念和外交政策。2013年后，美方试图将对话议题聚焦政治和国内治理等更具附加价值（value-added）的议程，以体现政党对话具有不同于其他机制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sup>[3]</sup>2014年第7届中美政党对话，则设置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双方各自国内治理议题。<sup>[4]</sup>这一时期，中美政党对话议题设置“由虚向实”，开始就各自国内治理问题、共同利益等开展战略沟通，就具体内政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对话的务实程度不断提升。

第三，在迎难而上期，对话议题侧重于促进增信释疑，重寻双方共识。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导致中美关系逐步陷入低谷的背景

---

[1] Piin-Fen Kok, “3rd U.S.-China High-Level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Dialogue,” EastWest Institute, October 12, 2011, <https://www.eastwest.ngo/idea/3rd-us-china-high-level-political-party-leaders-dialogue>.

[2] 《第五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华盛顿举行 王家瑞致辞》，中国政府网，2012年12月11日，[https://www.gov.cn/jrzq/2012-12/11/content\\_2287827.htm](https://www.gov.cn/jrzq/2012-12/11/content_2287827.htm)。

[3] David J. Firestein and Tony Bricktua, “Firestein Reflects on Seven Years of U.S.-China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Meetings,” EastWest Institute,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eastwest.ngo/idea/firestein-reflects-seven-years-us-china-political-party-leaders-meetings>.

[4] 窦恩勇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5）》，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下，2019年11月第11届中美政党对话，双方就两国的外交理念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进行讨论，围绕对外政策、贸易争端、新兴经济合作领域等相关议题坦诚交流。2021年9月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主题设置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前景：政党的作用”，希望以政党对话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共识。2023年5月第13届中美政党对话，双方围绕“中美相互认知与互利合作”主题开展对话，希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这一时期，中美政党对话的聚焦再度转向，议题设置“由实向虚”，各自国内治理等美方所谓的“更具附加价值”的议题逐渐退出，增信释疑、重寻共识的政治性议题回归成为主要议题，反映出其主要议题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紧张气氛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中美政党对话议题设置受两国关系演变影响显著。在两国关系缓和时期（中美政党外交的频繁互动期和趋于成熟期），中美政党对话的议题设置侧重于传播交流彼此政治见解，加强战略沟通，开展务实合作；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期（中美政党外交的迎难而上期），议题设置侧重于促进增信释疑，寻求双方共识，力图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

### （三）对话形式兼具官方性和灵活性

政党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方式，在形式上具有“亦官亦民”的特点。中美政党对话充分体现了两国政党外交在形式上的灵活性。

第一，美方协办机构的“非官方性”。历届中美政党对话，中方的主办机构均为中联部。美国两党因缺乏直接用于跨国交往的组织资源，则由与两党保持良好关系的智库、基金会协办。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协办了第1—11届中美政党对话，国际共和研究所、国家民主研究所等智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生、宝洁等美国企业常常出现在赞助人名单中，并选派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对话。受新冠疫情及财务问题影响，自2021年起，中美政党对话项目转由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负责美方协调，2021—2023年举办了第12、13届中美政党对话。<sup>[1]</sup>

[1] 参见 Alex W. Schulman, “The EastWest Institute Transitions for Post-COVID World,” EastWest Institute, January 7, 2021, <https://www.eastwest.ngo/idea/eastwest-institute-transitions-post-covid-world/>; “13th U.S.-China High-Level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Dialogue,” May 2023, <https://bushchinafoundation.org/event/13th-u-s-china-high-level-political-party-leaders-dialogue/>.



第二，交往对象的广泛多元性。2011年赴美出席第4届中美政党对话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同美国两党代表、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对话的同时，还广泛同美国工商界、学界、企业家等社会精英开展交流。通过参加高校、报社、智库、协会、基金会，工商界人士举办的午餐会、宴会、座谈会等，代表团广泛地向美国各界介绍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互信。<sup>[1]</sup>在北京举行的第3届对话期间，美方代表访问了四川省，参观了当地学校、社区并与村委会讨论了民主选举程序；在第6届对话期间，美方代表团到了江苏访问，并同南京市民营企业家和学生进行座谈。

第三，对话形式的多样性。201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第11届中美政党对话，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困境，中方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灵活性，积极尝试将会谈对话和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正襟危坐”的正式对话之外，中美代表还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我与中美关系40年故事分享”、轻松活泼的乒乓球和书法体验、品茶叙谈，这些活动为拉近双方的距离、增进相互理解提供了别出新意的互动环节。

#### 四、中美政党外交的政治效应

总的来看，中美政党外交在构建双方认知、加强战略沟通、推动务实合作、保留对话渠道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政治效应。

##### （一）交换政治见解：构建彼此正面认知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大国对于彼此的认知。<sup>[2]</sup>长期以来，国外政党、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主要依靠“二手信息”，甚至是几经转手、加工过的材料，信息失真就会导致认知扭曲。<sup>[3]</sup>正如前文所述，中美政党交往机制建立较晚，其重要原因是中美政党之间缺乏直接

[1] 祁菊、梅嘉：《增了解 聚共识 促合作——中共代表团访美暨第四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侧记》，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期，第16—18页。

[2] 《竞争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正轨系列评论之三》，新华网，2023年11月11日，[http://www.news.cn/2023-11/11/c\\_1129969987.htm](http://www.news.cn/2023-11/11/c_1129969987.htm)。

[3] 《“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北京开幕》，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3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4/09-03/6559915.shtml>。

对话和交流政治见解的渠道。加之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差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对国际问题的态度立场等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误解，这对双方正面认知的构建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美政党对话机制建立并连续举行对话，为美国两党同中国共产党构建彼此正面认知提供了重要渠道。东西方研究所认为，该对话机制“旨在通过就国内治理和外交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建立中美政治精英之间的信任和理解”。<sup>[1]</sup>通过当面对话交流、实地参观访问等活动，直接获取“一手信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促使美国两党逐步构建起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立体的正面认知，同时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党体制、运行机制等政治体制的了解。参加前5届对话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森表示：“两国必须找到合作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对话如此重要。我们每次会晤都看到双方的讨论越来越开放，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sup>[2]</sup>参加第8届对话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团团长、前贸易代表罗纳德·柯克认为，中美政党对话可以增进彼此了解，互学互鉴，“我们可以学习中国治国理政好的做法，中国也可以从我们200多年的历史中有所收获”。<sup>[3]</sup>中美政党对话交换政治见解的主要内容（见表4），可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表4 中美政党对话交换政治见解的主要内容

内容类型	中方介绍的主要内容（届次）	美方介绍的主要内容（届次）
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建设（第1届） 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科学发展观（第4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6届） 新中国建立70年的发展成就（第11届）	美国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美国政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两党的组织架构（第1届）

[1] The EastWest Institute, “Programs/East Asia/Dialogues and Impacts,” <https://www.eastwest.ngo/pillars/east-asia>.

[2] Alex W. Schulman, “5th U.S.-China High-Level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Dialogue Report,” EastWest Institute, December 14, 2012, <https://www.eastwest.ngo/idea/5th-us-china-high-level-political-party-leaders-dialogue-report>.

[3] 《第八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京举行》，新华网，2015年5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6/c\\_111520072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6/c_1115200720.htm)。

续表 4

内容类型	中方介绍的主要内容(届次)	美方介绍的主要内容(届次)
执政理念、重要政策及国内形势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第1、2、3、4、9届) “十二五”规划(第2、4届) 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第4届)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情况(第5、7届)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情况(第5届)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简政放权的情况;依法治国,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情况;“一带一路”倡议及潜在机遇(第8届) 改革开放新举措及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第11届)	美国两党的执政理念(第1、3届) 美国两党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第8届) 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和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挑战(第1、4、7、11届)
重要政治会议(事项)	中共十八大情况(第5届)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情况(第6、7届)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情况(第9届) 中共十九大情况(第10届)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情况(第11届)	2012年大选情况(第4届) 2016年大选前景(第8届) 2016年大选及特朗普新政府施政前景(第8、9届) 2020年大选前景(第11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1—2021)及公开资料整理。

第一,交换政治见解,增进彼此了解。在2010—2011年中美政党外交的“频繁互动期”,双方基本政治见解的交换,为加快彼此了解奠定了基础。美国东西方研究所时任高级副总裁方大为认为,中美政党对话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增进对对方国家政治的了解,以及这些政治如何影响政策选择。<sup>[1]</sup>在首届对话上,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情况,美方代表则介绍了美国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政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两党的组织架构等。2011年12月第4届对话,就是在临近2012年美国大选和中国准备迎接中共十八大之际举行的,增进了中美领导层换届时期双方的相互了解。此后的历届对话,中方广泛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的历程及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向美方展示了一个开放、务实、真诚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美方则介绍了

[1] David J. Firestein and Tony Bricktua, “Firestein Reflects on Seven Years of U.S.-China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Meetings,” EastWest Institute,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eastwest.ngo/idea/firestein-reflects-seven-years-us-china-political-party-leaders-meetings>.

大选公共舆论、大选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等国内政治议程情况。

第二，交流执政理念，开展重要政策沟通。在历届对话中，中方介绍了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等情况。美方则介绍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国“法治与反腐”等美方高度关注的议题，国务院法制办的负责人在第8届中美政党对话上介绍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情况。美方则从州政府和司法层面介绍了美国反腐败的经验教训。中美政党对话也为阐释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事务的主张、倡议和解决方案提供了平台，在第8届中美政党对话上，中国商务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向美方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给世界带来的机遇。

第三，传递重要政治会议、重要事项信息。中国共产党较早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立了重大会议相互通报机制，中美政党之间虽未建立专门的情况通报机制，但中美政党对话则发挥了类似作用。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及有关全会召开后，中方均会在当年或次年举行的中美政党对话介绍会议相关情况。美方则在大选或临近选举年份举行的中美政党对话中介绍相关选情及其新政府的执政前景。2013年11月第6届对话，正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中方介绍了会议成果及其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影响。2016年11月第9届对话，中方代表团针对美方关注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介绍了相关情况，美方代表则介绍了2016年美国大选及影响、特朗普当选后的施政前景等情况，并邀请美国有关研究机构负责人就“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与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发表主旨演讲。2017年12月第10届对话期间，东西方研究所董事会时任主席罗斯·佩罗（Ross Perot）表示，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和特朗普总统首次访问亚洲之际，这次政党对话可谓是恰逢其时。<sup>[1]</sup>通过政党外交渠道传递各自重要政治会议、重要事项信息，为中美增进战略沟通、了解彼此政策走向、保持各层级对话提供了特殊渠道，产生了对“一轨”外交有效补充的政治效应。

---

[1]《第十届中美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 进一步探讨未来两国关系发展》，央视网，2017年12月4日，<http://m.news.cctv.com/2017/12/04/ARTID3jYZxZ1sOVrjEhvgHgI171204.shtml?spm=C96370.PsikHJQIICOX.Em32AuyOHUeL.5>。

## （二）议题拓展：推动务实合作

在2012—2017年中美政党外交的“趋于成熟期”，双方务实交往的意愿不断强化，议题进一步拓展，促进务实合作成为中美政党对话的新内容。

一方面，促进中美地方交流。2012年12月第5届中美政党对话在华盛顿举办期间，中方代表团访问了纽约、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同政界、工商界、学界广泛接触，就深化中美省市地方合作交换意见，推动和促进了中美两国地方的相互了解和交流。美国相关州的政界人士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各省市各领域合作，参与中国建设发展进程，同时欢迎更多中资企业到美投资兴业。<sup>[1]</sup>第6、8届中美政党对话在北京举办期间，美方代表团访问了江苏省，对新浪公司和中关村创业大街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体验。

另一方面，促进中美企业合作。2015年5月第8届中美政党对话在北京举办期间，首次将中美企业家圆桌会纳入对话框架。京东集团、长安汽车、清华科技园等中方企业和通用汽车、强生公司等美方企业的高层代表围绕“近期中美经济形势与两国经贸合作”主题，就中美经济形势、中美企业合作开展务实对话，讨论了双边关系中的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问题，以及企业对开展跨太平洋业务的看法。在2019年11月第11届中美政党对话框架下举行的中美企业家圆桌会，主题设定为“开放创新共享未来：新时代中美经贸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双方围绕促进中美深入开展互利合作、消除两国经贸分歧开展交流。

## （三）保留对话渠道：促进国家关系转圜

中美政党对话的一个重要效应在于，可以建立和培养双方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双方关系需要或紧张的时候，这些关系可以作为沟通渠道。因此，尽管美方自2018年起冻结了两国之间的各类对话机制<sup>[2]</sup>，

[1]《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中共代表团访问美国犹他州》，中国政府网，2012年12月7日，[https://www.gov.cn/jrzg/2012-12/07/content\\_2284898.htm](https://www.gov.cn/jrzg/2012-12/07/content_2284898.htm)；《王家瑞率中共代表团7日会见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中国政府网，2012年12月8日，[https://www.gov.cn/jrzg/2012-12/08/content\\_2285899.htm](https://www.gov.cn/jrzg/2012-12/08/content_2285899.htm)。

[2]《谢锋大使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与美国资深媒体人举行专场炉边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网站，2023年7月20日，[http://us.china-embassy.gov.cn/dshd/202307/t20230720\\_11115684.htm](http://us.china-embassy.gov.cn/dshd/202307/t20230720_11115684.htm)。

但中美政党对话机制得以保留，并在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的 2019—2023 年期间仍连续举办了第 11—13 届对话，为中美之间沟通对话保留了重要渠道。梳理第 11—13 届中美政党对话双方的主要观点（见表 5），可以发现，政党外交为中美开展沟通交流、寻求共识、促进两国关系转圜保留了重要对话渠道，并具有以下特点。

表 5 中美政党外交在“迎难而上期”（第 11—13 届）双方的主要观点

年份	届次	双方观点	
		中方观点	美方观点
2019	11	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各国的利益； 加强合作而不是对抗，彼此融合而不是脱钩，扩大交往而不是隔阂；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矛盾分歧； 希望通过政党对话，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繁荣对彼此有利； 应促进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 希望早日结束美中经贸摩擦。
2021	12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通过政党对话等渠道深化交流合作和沟通协调。	中美关系对两国和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 当前美中相互竞争明显增加，但仍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继续通过政党对话促进两国沟通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
2023	13	中美如何相处至关重要，双方要采取措施，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并健康发展； 中美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不能搞对抗冲突； 应当加强交流对话，增进人民感情，促进互利合作； 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第一，即便在中美关系困难时期，政党外交作为保留对话的渠道仍是双方共识。在第 11—13 届中美政党对话上，双方均认为要继续通过政党对话机制推动交流合作和沟通协调，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在这一时期，中方始终高度重视政党外交在保留中美对话渠道方面的积极作用，对美方参会代表给予充分的外交礼遇。时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分别会见来华参加第 11 届中美政党对话的美方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以政党对话保



持中美沟通、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理性发展的重视。2019年11月会见参加11届对话的美方代表时，杨洁篪指出，“两国政党之间加强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并“希望双方用好政党对话平台”；美方表示，“美两党政见不同，但代表团成员均希望中美关系克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sup>[1]</sup>在第12届对话上，双方认为政党对话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增进两国的相互沟通和信任，尽管中美关系经历了艰难时刻，仍需要保持高层对话，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增添更多积极因素。<sup>[2]</sup>在第13届对话上，双方明确表示“同意继续开展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的交流对话”。<sup>[3]</sup>

第二，尽管中美政府之间存在分歧，但双方在政党外交层面仍能取得共识。相对于中美政府外交体现出的分歧和交锋，中美政党代表在“管控分歧”“加强沟通对话”“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等诸多观点上仍能达成一致意见。参加第11届中美政党对话的双方代表均认为，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各国的利益，中美应加强合作而不是对抗，应彼此融合而不是脱钩，应扩大交往而不是隔阂，共同呼吁中美两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应以增进民众福祉为目标，促进互利合作，妥善处理分歧。<sup>[4]</sup>即便是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时，“中美如何相处至关重要，双方要采取措施，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并健康发展”仍是参加第13届中美政党对话双方代表的共识。<sup>[5]</sup>

第三，以中美政党对话积极配合两国关系转圜。2021年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与拜登总统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sup>[6]</sup>三天后，即在9月13—14日，

[1]《杨洁篪会见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代表团》，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2日，第2版。

[2]《第十二届中美政党对话举行》，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14日，第3版。

[3]《第十三届中美政党对话举行》，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25日，第3版。

[4]《第十一届中美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网，2019年11月1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18/content\\_545317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18/content_5453179.htm)。

[5]《第十三届中美政党对话举行》，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25日，第3版。

[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11日，第1版。

双方以视频形式举行了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可以视作双方通过政党外交渠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及时反馈。2022年11月，中美元首的巴厘岛会谈促进了两国关系回暖，但3个月后的“飞艇事件”<sup>[1]</sup>导致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两国之间的对话沟通整体处于“僵冷”状态。直至2023年5月23日举行第13届中美政党对话，这是双方为打破僵局释放的重要积极信号之一。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表示，中方“会继续同美国政党、议会、各界开展这样的对话，以增进了解”。<sup>[2]</sup>第13届中美政党对话举办后，美方政界人士相继访华，两国元首实现了旧金山会晤，中美开展新一轮互动，两国关系逐步止跌回稳。

#### （四）中美政党外交政治效应的限度

尽管政党外交在中美双方构建正面认知，推动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关系转圜上发挥着积极的政治效应，但必须正视的是，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运行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仍将制约政党外交的政治效应。政党外交虽能为中美开展沟通保留对话渠道，但并非是解决两国分歧的治本之策。

一是美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是中美政党外交政治效应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桎梏。历经十余次直接对话，美国两党对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认知逐步发生转变，从最初对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心存芥蒂到重视这一对话渠道的独特作用。但必须清醒客观看待的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偏见甚至敌视立场始终是横亘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尽管两党在美国国内政治进程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有诸多龃龉，但“政治不过海”（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sup>[3]</sup>原则在涉及国家安全、意识

---

[1]《外交部就美方宣称击落中国无人飞艇发表声明》，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302/t20230205\\_11019861.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302/t20230205_11019861.shtml)。

[2]《中联部部长：将继续同美国的政党、议会等开展对话以增进了解》，中国新闻网，2023年7月2日，<https://www.chinanews.com/m/gn/2023/07-02/10035527.shtml>。

[3]“政治不过海”是美国政界广为流传的谚语，主要是指党争应仅限于内政，对外则要保持一致。参见《2022年美国民主情况》，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20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new/202303/t20230320\\_1104447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new/202303/t20230320_11044478.shtml)。

形态、价值观等对华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2021年美国政党轮替并未改变美国对华竞争态势，美国对华战略遏压已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探索期和试水期步入拜登政府的定型期和深化期。<sup>[1]</sup>除此之外，作为两党的主要活动场域，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显著变化，民粹主义抬头，政治极化加剧，民众整体对华民意持续恶化，国内政治进程变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限制了两党精英以政党对话推动中美关系协调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此背景下，尽管两党代表在政党对话中表达了希望妥善弥合中美分歧的愿望，但事实上却难以指望这些“口头共识”能够跨越美方所固守的意识形态偏见。

二是政党外交共识难以转化为美国政府的具体行动和政策。作为非政府外交，党际外交形成的共识并非法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可靠承诺。<sup>[2]</sup>尽管美方代表团在每次对话后都会向白宫、国务院、国会等美国当局利益攸关方（USG stakeholders）提交对话的书面要点摘要<sup>[3]</sup>，但即便是在中美政党对话“频繁互动期”和“趋于成熟期”，双方的共识也往往停留在口头上，鲜少能够看到美方有落实对话共识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另外，美方参加政党对话的代表都只是前高官和学界、商界人士，面对美国国内喧嚣尘上的反华情绪，也难以评估美方是否有将对话共识转化为推动美国当局具体行动和政策制定的意愿和资源。

三是政党外交在中美两国关系困难之际是难得的对话渠道，但其“雪中送炭”的效应仍有待进一步发挥。中美政党对话的开启、频繁互动以及趋于成熟，正值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际。在此背景下，中美政党外交作为两国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其积

[1] 王浩：《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69页。

[2] 温尧：《深化政党跨国交往的学理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11日，第3版。

[3] David J. Firestein and Tony Bricktua, “Firestein Reflects on Seven Years of U.S.-China Political Party Leaders Meetings,” EastWest Institute, November 11, 2016, <https://www.eastwestngo/idea/firestein-reflects-seven-years-us-china-political-party-leaders-meetings>.

极的“锦上添花”政治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然而，当美方强化对华遏制打压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时，中美政党外交可以起到保留对话渠道和加强沟通的作用，但能否进一步为改善两国关系“雪中送炭”，则完全取决于美方能否放弃对华错误认知、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并切实与中方相向而行。

## 结语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受到学界关注，一些研究试图对这一独特的外交形式进行学理性考察。<sup>[1]</sup>然而客观而言，尽管有的国外学者关注到了政党以及政党国际交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sup>[2]</sup>，有的国内学者呼吁“把政党找回来”<sup>[3]</sup>，探索将政党政治置于国际关系中考察，但由于传统西方政治科学体系主要关注政党的国内政治活动，政党国际交往并未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从实现层面来看，尽管政党外交政治效应的发挥受到多重因素限制，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形式，业已连续举办13届的中美政党对话在构建双方正面认知、推动务实合作、在两国关系紧张时保留对话渠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政治效应。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了“旧金山愿景”，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当前也在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但会晤后美方对华遏制打压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sup>[4]</sup>尽管目前2024年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没有过度炒作中国议题，但对华遏压已成为美两党的基本共识，美方加剧对华竞争的态势在未来一段时期难以看到明显的调整迹象。在此背景下，

---

[1] 李晨阳、窦孝勇：《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载《学术探索》2024年第3期，第35—45页。

[2] Tapio Raunio and Wolfgang Wagner, “The Party Politics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6, No. 4, 2020, pp. 515—531.

[3] 钟准：《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2期，第33—52页。

[4] 《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外交部网站，2024年7月27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407/t20240727\\_11461711.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407/t20240727_11461711.shtml)。

中美之间常态化、持续性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对话与战略沟通十分必要。<sup>[1]</sup>作为机制化的对话渠道,中美政党对话可以为双方开展战略沟通、管控分歧提供有益框架。

未来,中方应继续重视和发挥中美政党外交作为中美之间特殊的“二轨”对话渠道在增信释疑、促进共识的灵活作用,在推动中美探索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正向效应。一是突出战略性,继续将中美政党对话作为协助两国政府开展战略沟通、有效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的常态化渠道,以政党外交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向美方阐释中方政策立场、拓展双方战略沟通空间。二是突出务实性,继续办好对话框架下的中美企业家圆桌会,常态化开展两国企业合作交流,以政党外交渠道为避免中美“脱钩断链”提供思路。三是突出民间性,发挥政党外交“亦官亦民”的灵活特点,结合中美民间友好历史在政党对话框架下开展人文交流、民间交往,为两国关系发展厚植民意基础。

【 来稿日期 : 2024-06-10 】

【 修回日期 : 2024-08-08 】

( 责任编辑 : 马燕冰 )

---

[1]《吴心伯：多层次对话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必由之路》，复旦发展研究院网站，2023年5月29日，[https://fdi.fudan.edu.cn/\\_t2515/a8/bb/c18965a501947/page.htm](https://fdi.fudan.edu.cn/_t2515/a8/bb/c18965a501947/page.htm)。